


第三种比较文学的 观念

张哲俊 著

文学考古学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第三种比较文学的
观念

张哲俊 著

文学考古学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文学考古学的可能性/张哲俊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6573-4

I. ①第… II. ①张… III. ①比较文学—研究 IV. ①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4600 号

- | | |
|-------|--|
| 书 名 | 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文学考古学的可能性
Di-san Zhong Bijiao Wenxue de Guannian |
| 著作责任者 | 张哲俊 著 |
| 责任编辑 | 朱房煦 黄瑞明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573-4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zhufangxu@yeah.net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
| 印 刷 者 | 北京大学印刷厂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5.25 印张 385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65.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绪 论 文学研究的反思:走向六经皆史的诗学传统	1
第一章 文学考古的可能性	12
第一节 概念、对象与任务	12
第二节 文学考古学的可能性	27
第二章 六经皆史的诗学传统与诗歌的历史化	43
第一节 六经皆史的模式:诗歌为史与经学的关系	43
第二节 诗歌为史的模式:日记化就是历史化	69
第三节 不完整的历史化:虚构想象的合理性与历史的关系	94
附 录 中国古代文学中日本形象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120
第四节 “有诗为证”:小说、戏曲套语的经学渊源与功能	135
第三章 第三种比较文学关系的构造与性质	156
第一节 第三种比较文学关系	156
第二节 考古层的构造与形态	188
第三节 第三关系的交流方式	215
附 录 享保大象的到来与日本的诗人	245

第四章 文学考古学是第三种比较文学的一种方法	264
第一节 连续时空的还原与综合研究	264
第二节 不连续时空的还原与第三研究	288
附录 日本绘双六的起源与中国的彩选	319
第三节 事实研究科学化的可能性	339
第五章 研究模式的反思:文学研究也是史学研究	358
第一节 历史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与意义	358
第二节 诗文史学价值的特殊性	376
结 语	389
参考书目	393
后 记	398

绪 论

文学研究的反思： 走向六经皆史的诗学传统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文学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专家学者无数，专著论文无限，呈现了极其繁荣的景象。这是以完全不同于古代学术的新模式展开的，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这是使学术研究走向更为成熟的基础，然而这基本上是在西方学术研究模式基础上展开的。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实践，西方的学术模式也早已为学术界熟悉，成为了中国自己的研究模式。近些年来，学术界的一个关注热点是梳理 20 世纪的研究状况，这些研究多着眼于百年研究的具体成果，指点成就与问题，极少反思研究模式的问题，没有探索更为根本性的问题。西方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代表了学术的最高水平和最为前沿的问题。引入西方文学的观念与学术研究的模式，就意味着学术的进步，尽量与西方学术发展保持同步，是数十年来学术研究的方向。近代引入了西方文学的观念与学术研究的模式之后，在诸多方面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也留下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现当代文学自觉地按照西方文学的观念进行创作,因而以西方文学的观念与研究模式展开研究,不存在太多的问题。但是古代文学是在完全没有西方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写作的,尤其是诗文写作存在更多的问题。在西方文学的观念与和学术研究的模式变成了自己的模式之后,很多问题虽然明显地存在,但也很容易视而不见。中国古代诗文的传统与西方文学观念、学术研究模式之间的差异,究竟造成了怎样的问题,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甚至中国古代诗文的传统是什么,也成了令人困惑的问题。从幼年学习文字以来,就不断地接触中国文学,又从事数十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终提出何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问题时仍然不免有些茫然。

章学诚曾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六经皆史的命题中也包括了诗文为史的命题。从这个观点来看,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存在许多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一方面西方的文学观念与研究模式推动了学术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导学术偏离了中国古代诗文的特征与传统,在不知不觉之中造成了很多重大的问题。

第一,反映生活的创作论与记录生活的吟诵说。

文学创作论是文学理论的核心部分之一,一般认为文学创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生活的提炼和提高,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与本质的真实。从生活的事实到艺术的真实,需要发挥作家的想象与虚构。所谓的创作蕴含了丰富的想象与虚构,这是文学艺术的特权,也是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这种创作理论源于西方,现在早已成为文学艺术的真理,也是普通人的常识。然而这种理论并不一定适合于所有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或东亚的古代诗文。六经皆史的观念将诗文划入了史的范畴,诗文为史被视为中国的基本传统。中国古代文论中几乎不大使用创作一词,古代文论并不缺乏创作论,但以创作一语概括古代诗文的写作不是十分适宜。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创作”一词,早在先秦已有,但几乎不用在诗文写作方面。称诗文写作时使用赋、吟、诵、歌等词汇,这些词汇中并不直接包含虚构创作的意义。古代文人不用“创作”一词,说明古代诗文写作基本上不是创作活动。诗文也是历史,史书的基本写作方式是记录。所谓左

史记言,右史记事,记录也是诗文写作的基本方式。

诗歌与历史并不完全等同,毕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就说明诗歌需要历史化的途径,诗歌历史化的主要途径是日记化。日记这种文体在中国真正成为普遍使用的文体较为迟晚。日记即使是在正式出现在文坛之后,也不是很受重视。文人更喜欢以诗歌记录生活中的事件与情感,以诗歌来满足日记的需求是古代文人的普遍现象。中国历史上从来不说创作史书、创作日记,史书与日记不是创作出来的。诗歌也不是创作,是以美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因而古代文人称之“史之华”和“史婉”。如果记录是诗歌写作的基本方式,那么与西方的文学理论就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亚里士多德认为,希罗多德的史书改写成韵文,也仍然是历史,不是文学。但刘勰的观点完全相反,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意思是以韵文写历史事件,那么就是诗歌,就是文学。诗人可以用韵文写史,如果以韵文记录日常生活,那么诗歌也是历史。这也是六经皆史、诗文为史的合理根据。

然而六经皆史,诗文亦史,并不能覆盖所有的古代诗文。六经皆史是传统,而不是普遍有效的真理,也不是普遍的原则。所谓的传统是指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的现象,传统与覆盖面有关,传统从来都不是绝对全面的覆盖。如果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时间性,就可以称之为传统。任何文化既有传统,也有非传统。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之后,也意识到六经皆史不能覆盖所有的诗文。他在方志的篇章指出了艺文确有不合史学的因素。如果将六经皆史定位于传统,那么诗文亦史也同样应当定位于传统。

第二,自圆其说的主张与科学标准的对立。

文学研究从来都不是科学研究,正如人文学科不是人文科学。文学研究不是科学研究,因为文学研究没有客观的标准。研究结果的好坏正误,完全取决于人的主观判断。文学是主体的产物,依据主体的判断评价学术的高低就成了必然现象。根据这种看法,学术成功的关键在于学说能否自圆其说。所谓的自圆其说就是找到一定的合理性,能够进行较为合理的解释。合理阐释的基础是主观的判断,由于解释者的主观认识不同,也就会找到各自不同的合理性。不同的合理性之间并不存在正误是非之别,如果存在正误是非,就不可能把自圆其说作为研究的原则。文学研究的主要是文学的思想情感等主体的因素,既然是以主体思想为主要

研究对象,也就不大容易具备客观性,这与自圆其说的原则协调一致。这种看法在主体研究的层面上存在着一定的有效性,但文学研究并非都是主体因素,客体的事实具有不同的性质。

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史的研究总是要研究历史事实。历史是已经成了过去的事实,不管喜好如何都不会改变。历史的事实是客观存在,历史事物的研究也就会有客观的标准,不应当自圆其说。章学诚的“事有实据”“理无定形”,似乎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是两种研究方式,也是两个层面的研究,一是事实层面的研究,一是理论层面的研究。事有实据的意思是事实层面的研究总会有实据。实据可以成为定据,有了定据就可以产生客观的定论。定论不是依据主观性来决定的,而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定论不应当是根据持有相同见解的人数决定的,客观性不取决于赞成与否的人数。理无定形是理论研究,是形而上的道的研究,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也就难有实据。既然没有实据,那么必然会见仁见智,也无所谓正误是非。这也就是自圆其说,是一种理论化的研究。事的研究有正误高低区别的标准,理的研究就是自圆其说的主观阐释,两种研究的不同显而易见。如果六经皆史,诗文亦史,那么诗文研究也应当是事有实据,也可以具有客观的标准,并不都是自圆其说的主观阐释。文学研究也可以具有科学性,但文学的科学性多限于历史事实的研究,而不一定是主体思想情感的研究。如果文学研究也可以具有客观的标准,就应当改变主观判断的认识。凡是符合事实的,就是正确的研究;凡是不符合事实的,就是错误的研究。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还原历史事实,还原的历史事实便是判断正误的标准。

文学研究建立正误标准不是不可能的,正误标准的建立对文学研究来说极其重要的。尤其是文学研究向来被认为缺乏科学性,就更需要建立科学的标准。符合科学标准的研究,就是高水平 and 先进的;反之,就是低水平和落后的。由于文学研究没有科学标准,价值判断也会因人而异。运用了理论的研究,就是高水平 and 先进的。用了最新的理论就是最高水平的时代标志,比运用旧理论或没有运用理论更为先进。如果从新的理论转向于旧的理论,那是倒退和落后。新的理论总是比旧的理论先进,因为理论也总是向前发展,时间的先后顺序就成了是否先进的标志。以上

是普遍流行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中唯一找不到的最关键的概念就是正确性与客观性。离开客观性与正确性,讨论学术研究的先进性与落后性,显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新近的理论和研究未必是正确的,过时的理论与研究也未必是不正确的。先进与否,最重要的是否得到正确的结论。

建立客观标准存在种种挑战,挑战主要是来自于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新历史主义宣称历史不可还原,后结构主义宣称作品没有自身的意义,阐释学无限地扩大阐释的有效性。既然事实不可还原,作品没有原义,读者可以任意解释,也就不可能存在文学研究的客观标准。20世纪很多西方文学理论在本质上存在着相通之处,这些理论给读者展开了无限的自由空间,充分地肯定了读者的意义。然而诗人写诗总是有自己的目的,也有特定的内容,这决定了作品的基本意义,也规定了文学的事实性。历史事实能否还原,作品有无本意,是建立科学标准的基础。一般的读者可以自由地欣赏作品,但这不等于作品没有原意。历史不能全部还原,但是部分的还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如果说历史不可还原,那么考古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考古学的存在就是为了通过研究物质还原历史事实,考古学的研究证明,尽管历史事实的还原相当有限,但终究是可以还原的。如果诗文也是历史,那么必然就可以还原。如果诗文中的历史事实可以还原,那就证明诗文研究也可以具有客观的科学标准,并不可以随意阐释。至少文学的事实研究是不可以自圆其说、随意解释的,文学研究也有可能成为科学研究。

第三,思想研究作为第一研究的偏误。

思想研究作为文学的第一研究,是近代学术建立以来的基本模式。这是来自西方的研究模式,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一般认为文学近于思想,远离历史。作家创作作品是为了表达他对生活的认识,而不是为了记录生活。深刻思想是作家创作的基本理想,作家要不断地探索和创造新的思想,新的生活给作家带来新的认识和新的思想。创造思想,挖掘灵魂,是作家的使命,作家与思想家在这一点上没有区别。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拷问人类灵魂深处的善恶是非,是作品必须直面的问题。文学创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表现作家创造的新思想,那么学术研究也必然是围绕着这一主要使命展开。分析和阐释作家的思想是学术研究的第一任

务,只有通过分析和阐释作品的思想,才能够真正读懂作品。作品的艺术风格、语言技巧、结构形式等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些研究就没有思想研究那么重要。这种看法也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真理,至少绝大多数的人愿意相信这样的理念。

然而并不是世界上所有民族、所有时代的文学,都是把思想创造作为创作的第一任务,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看法。六经的地位主要在于经学的思想,儒家的思想是经学的核心问题。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把史学放在了更高的地位,史学变成了第一。最初六经也不是什么经,只是史而已。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六经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经学地位,六经的儒家思想也成了统治的意识形态。章学诚反对荣经陋史,主张荣史陋经。荣史陋经不只是一种策略,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概括。诗人固然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但很难认为诗中的喜怒哀乐都有思想的深刻性,也不见得有伟大的思想创造。杜甫是最伟大的诗人,但他的诗歌思想没有多少真正的思想创造。在其他三流、四流乃至末流的诗歌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思想。诗人的思想创造未必比思想家的思想更为深刻,更为丰厚。其实中国古代诗人更热衷于以诗歌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而不是冥思苦想地创造新思想,达到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深度。诗歌的日记化使诗歌更近于历史,而不是更近于哲学或思想。中国古代诗人也有自己的思想创造,但无法与古代思想家、哲学家相提并论。如果将诗人的思想创造与思想家、哲学家直接加以比较,会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因为诗人不是思想家或哲学家,两者不应当存在可以比较的关系。但不无遗憾的是,在实际的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就是研究诗人与儒释道的关系,或者用某一思想家和哲学家的观念来分析研究。既然诗人不是思想家或哲学家,那么直接以儒释道或其他思想、理论研究诗人的思想就显得非常怪异了。既然诗人不是思想家,那么就不应当以思想家的观念去分析诗歌,因为诗歌与思想并非同一种现象。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这应当属于跨学科比较研究。然而目前这种研究方式被认为是最纯粹的文学研究,获得了文学研究的正宗地位。可是现在又反对直接比较诗人与思想家的思想贡献,只是根据一时的需要而已,并无科学的根据。也就是需要的时候借来分析,不需要的时候就装作

诗人与思想家没有什么关系。

第四,引入新的文学观念与掩盖文体的差异。

从文到文学概念的转换,是在近现代以后发生的。这一概念的转换过程首先是在日本文学中展开,接着是在中国、韩国文学中展开的。然而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或韩国,人们都没有认真地反思过文与文学的本质差异究竟在哪里。从文到文学的转换主要是将东亚文学与西方文学观念结合的过程,通常将这个过程称之为文学近代化。文学近代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盘地吸收西方的文学观念,二是建立了西方的学术研究模式。

在从文到文学的转换过程之中,脱落了文体的本质因素,那就是失去了文的历史因素。从六经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本质因素的脱落,也意味从记述为主的文走向了以虚构为主的文学,从历史的文走向了思想的文学。引入西方的文学观念之后,文学有了新的发展,这种新的发展给文学带来了新的生命力。然而无论是诗人还是学者,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从文到文学的转换过程中脱落了什么,这个转换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匆忙完成的。在西方强权话语的力量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尽快地使文学观念、创作方式西方化。西方文学观念与学术模式背后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都足以证明西方的文学观念与学术模式的先进性。直到现在,即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经常会忘记物质生产与文艺发展的不平衡理论。只要是西方的文学观念就是合理的,也是科学的。在时代的强音和急迫的时间中,不会意识到这个转换究竟遗失了什么,只是简单地将小说和戏曲纳入到文的范畴,将文换成了文学,小说代替诗歌占据了文学的主要地位。从诗歌到小说不只是文体的地位变化,梁启超等人意识到了小说更大的社会作用,呼吁小说时代的到来。文学创作也正如梁启超等人所期望的那样,迎来了小说的时代,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这一变化给文学观念带来了更为深刻的巨变,这是从诗歌到小说、戏曲的变化也是从历史到虚构的变化。小说和戏曲是不可能以日记化的方式写作的,文体的地位变化是从历史转向思想的途径。这是本质的变化,并不仅仅是文体的变化,然而遗憾的是学术研究没有在本质层面上认识文体地位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在小说和戏剧占据文学的主要地位之后,

新的诗歌也随风而动,走向了思想。脱离史学,走向思想,历史已经不再是文的一部分,只是成为了与文学有关系的领域。对于中国古代诗文来说,这是本质的变化。小说和戏曲需要更多的虚构与变形,提炼与提高是主要的创作方式。小说和戏曲更适合于现在的主流文学理论,现代以后的诗人也向着这种文学观念靠近,也以小说和戏曲的方式写作,也完成了从记录到创作的转变。现在主流的文学理论适合于现代的小说、戏剧与诗歌,但不一定适合于古代的诗文。以不适合于古代诗文的理论进行分析,就很可能偏离古代诗文的实际特征和传统。文史不分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但经过近代文学的观念革命之后,诗歌与历史完全成为了两个领域。在整个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之中,诗歌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但诗歌极近于历史,基本上可以认为以诗为史是古代诗文的传统。在诗歌中进行史学研究,或者是物质史的研究,是文学在史学领域“越界飞行”,是错误地跨越了文学与历史的分界。然而文学与史学的界线是近代以后界划出来的,近代之前并不存在文学与史学的分明界线。文史不分是古代的常识,也是事实,但是在脱离了古代学术话语之后,就忘记了文史不分。所谓的“越界飞行”是在近代以后产生的学术话语下出现的说法,既有的话语其实就是西方文学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术话语,也就是西方的文学与史学差异的认识。从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学研究观念来看,这是地地道道的“越界飞行”,或者说是完全搞错了研究对象。既然连研究对象都没有对准,那又何谈学术研究呢?近代以来强行阉割文史,并早已习惯,成为自然思维。如果回到古代文史不分的传统思维,就不会产生“越界飞行”的感觉,而是会感觉到回归了原初和传统,是脚踏实地地站在了土地之上,而不是站在空洞的理论与观念之上。还原到固有的传统,从固有的真实传统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的研究模式,就会明白已经偏离传统有多么远。由此重新研究,无疑会更为接近固有的传统,也可以寻到复古式的创新道路。

小说和戏曲成为了文学的研究对象,并且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主体部分。这无疑大大地推动了小说和戏曲的研究,这是建立近代学术以来的巨大成果,使小说和戏曲研究也具有了和经学同等的地位,甚至是更高的地位。这种变化在经学研究的框架内是无法想象的。以小说和戏曲为主

体建立的文学理论,在没有自觉意识的状态下,遮盖了古代诗文的特征和传统。

百年学术研究存在种种问题,那么如何证明确实存在上述的问题,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摆脱上述的困境,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最为显见的途径是研究文学中的物质史,文学中的物质不是实物,但也会保持一定的物质特征,更容易具有客观性,使文学研究更近于科学。考古学比文学研究更为客观和科学,主要是与研究对象和方法有关。实物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也为考古学奠定了科学性。考古学的科学性建立在实物研究的基础之上,如果不是以实物为研究对象,就不大容易将自然科学的实验引入到考古学研究中来。考古学的研究不都是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实验也只局限在一部分,自然科学不能解决所有的考古学问题。相当多的部分还依赖于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即比较、归纳、描述的方法,这是考古学更为普遍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考古学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物质,不断重复出现的物质,是认识和辨别新出土物质的根据。以已知的物质认识新出土的物质,也是认识未知物质的基础。如果仅仅是出现过一次,那么这种物质就很难认识,需要从未知物质与已知物质的关系来认识和判断。显然重复出现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条件,比较、归纳、描述的方法就是建立在重复出现的物质现象。比较、归纳与描述也可以运用于文学中的物质研究,文学中的物质也有着与考古学的实物相似的物质特征,相同的物质或类似的物质也会不断地重复出现。这是移用考古学方法的可能性,尽管不能使用实物研究的自然科学方法,但也可以取得科学的成果。考古学的目的是还原历史事实,并取得科学可靠的结论,不是主观地任意阐释。考古学研究也会存在完全对立的结论,但这不是考古学的问题,而是重复出现的物质太少,也是因为缺少相关的文献资料。比较、归纳和描述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与实物的自然科学化验方法得出的结论相合还是普遍的。文学中的物质史研究必须以文学也是历史为前提,否则文学中重复出现的物质现象不一定具有历史的意义。在完全虚构的文学中,相同的物质无论怎样重复出现,都很难具有史学的价值。

文学中的物质史是近代以后被遗忘的角落,这是因为主体研究几乎

成了文学研究的全部,文学中的客体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赶出了研究的范畴。文学是由主体的思想情感与客体的物质结合构成的,把主体作为研究的唯一对象,那至多只是进行了一半的研究,或者是一多半的研究。不完整的文学研究是十分可疑的,只有进行完整的文学研究,才会发现存在的问题,也有可能解决问题。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一些变化,出现了若干研究文学中的名物学著作。但目前出版的名物学著作,主要是更多地使用了考古学的成果,与古代的名物学没有太多的方法上的变化。本书要通过文学中的物质史研究尝试是否能够还原物质事实,在此基础上反思目前的主流文学观念与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宜于中国古代诗文和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通过这样的研究,也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诗文的基本特征,看到不同于主流文学理论的实际状况,希望能够由此找到更为适合于中国古代诗文与古代比较文学的研究模式。

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几乎都是舶来品,能否建立一种建立在中国文学古代理论基础上的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对于中国的比较文学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课题。中国的比较文学总是以中国文学为核心展开的,没有了中国文学,中国的比较文学就难以生存和发展。既然是把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当作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领域,也就可以借用中国古代理论,建立适合于中国文学与东亚比较文学,乃至适合中国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如果能够根据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最终提出于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有意义的观念与方法,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一直都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或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么,有无可能改造和运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中国文学的理论来研究东亚文学,研究比较文学或外国文学呢?过去有人提出过古为今用的方法,但终究没有实现这一理想。现在提出不仅古为今用,而且还要中为外用,走出中国学术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学术的理想,也应当是努力开拓的道路。中国学术不应当总是跟在西方学术的后面紧追慢赶,这样永远不如西方的学术。创造自己的学术,既要学习,但也不能一味地移用。中国古代丰富的诗学理论,已经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如何运用中国的文学理论来研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东亚文学是最适合尝试的对象之一,毕竟东亚文学

具有类似的传统。文学考古学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文学与比较文学,乃至现当代文学,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人曾宣称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是比较文学,那么以中国文学理论来研究外国文学似乎也可以算是比较文学。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文学考古学绝不是这样的研究,文学考古学的目的是考察文学关系的各种现象,不是以理论解释已有的现象。

第一章

文学考古的可能性

第一节 概念、对象与任务

一 考古学与文学：研究对象是物质

文学考古学是没有人提起过的新名词，这个名词令人想到的是各领域的考古学，如社会考古学、经济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兵器考古学、艺术考古学，等等。各种考古学不断地涌现，呈现出热闹的景象。各科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发展和丰富，然而文学考古学绝不是考古学的发展，而是文学研究的发展，研究的核心仍然是文学。

目前为止无人使用文学考古学这一用语，其原因之一是学术界尚无称之为文学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学术界广为人知的是艺术考古学，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墓中出土的各种古